

◆白城英烈

马仁兴 (一)

●李志明

长夜求索。

马仁兴(1904年—1947年),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游庄后张范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家有田百余亩、房十余间。从祖父起,马家人就酷爱读书,不重农耕。仁兴的父亲、伯父都念过书,父亲是小学教员,伯父是秀才。仁兴8岁入私塾就读,以后又到本村小学读书,直到小学毕业,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家乡度过的。

马仁兴的祖父、父亲在村里很讲义气,重节操,常以历史上的清官廉吏、民族英雄教育后代,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仁兴,使他从小就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尽管这些教育较多地含有封建伦理道德的成分,但却对马仁兴以后的正直处事、友爱为人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仁兴从小聪慧、勤奋,到14岁时写得一手好字,擅长画水墨竹梅,成了当地有名的“秀才”。他性格温和、内向,在小伙伴们中有“小绵羊”之称。他善于助人为乐,村中有座三官庙,人们迷信说三官庙能保佑人们躲过水灾,可是这座土庙由于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破损,马仁兴主动将它修复。一念叨起这事,年纪大的叔叔、伯伯们都夸他是个好学生。马仁兴读完小学,正值时局动荡,未能继续求学。

马仁兴虽居乡村并不孤陋寡闻,辛亥革命后的动乱时局诸如张勋复辟的丑态,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军阀之间的混战以及“五四”运动的呐喊,一股股社会激流都从北平流进小小的平乡县城,走进马仁兴稚嫩的心田里。

此时,马仁兴17岁,他还不懂得反帝反封建的含义。但他却憧憬着家乡外边的世界,渴望走向众象纷呈、浩瀚的社会海洋里见识世面,1920年下半年他第一次离家出走,奔赴陕军第三混成旅当兵。

从1920年到1924年间陕军生活,虽然不曾给马仁兴带来什么新鲜营养,但却使他扩大了视野,初步认识到了军阀割据给人民带来的只能是灾难。由于这个原因,马仁兴1924年初决然脱下军装,重返故乡,耕耘于阡陌之间,再度过起简单而朴素的农家生活。不久伯父与父亲拆局,马仁兴的父亲分得薄田30亩,因而家境日艰。这一年,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马仁兴的血沸腾了,挥笔疾书,写下一首胸怀大志的壮丽诗篇:

夜深人静五更寒,半片残月照窗前,邪雾尘污遮大地,何时旭日照人间。

哺乳虽重母命危,巢毁岂能有完卵。到处黄土皆埋骨,血染征袍何堪怜。

父亲见诗,知儿肝胆非凡,教育和鼓励儿子实现抱负。马仁兴在乡间住不到半年,便二次从军,托人在大名(今河北省南部)国民党军队里找到一个文书的位置。1925年,这支部队调到信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从此,马仁兴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26年,马仁兴随同国民革命第三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同年11月,马仁兴考入该军在开封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年龄的增长,革命形势的发展,文化素养和阅历的累积,使他对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进行寻求和探讨。在军官学校,他有幸结识了李若遇、李茂林等进步青年,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党刊刊物。这些对马仁兴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马仁兴在自传里叙述的那样:“这里有不少进步分子,如李若遇、李茂

林等(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由于他们的帮助和澎湃的革命运动,使我在政治上得到初步的认识,但那时还是‘三民主义’式的,而对共产主义尚无深入的了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大批工农群众、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决裂了。马仁兴所在部队的共产党人奉命转移,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真理的声音被封锁了,北伐战争中途夭折,眼见风卷云涌的革命浪潮低落了,马仁兴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但是,同事兼挚友李若遇、李茂林等人在他心头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逐渐萌发。他变得深沉了,平日很少言语,只是用那深邃的目光观察着这血淋淋的世界,心里却反复思索着北伐革命军“总司令”为什么会突然变卦呢?

1928年由校方组织,马仁兴随集体加入了国民党。1929年被派到冯玉祥部西北军骑兵第一师任团政训处长。

1930年,蒋介石培植嫡系势力,排斥异己的罪恶用心已路人皆知。于是,冯玉祥、阎锡山率先反蒋,爆发了持续7个月的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时,马仁兴昼夜在前线作反蒋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冯玉祥失败后,马仁兴随同部队投降蒋介石,该师被改编为骑兵第三师,马仁兴先后任过该师的参谋、参谋处长、参谋长等职。

1930年9月,马仁兴部驻防江苏丰县,一时断了给养。为找粮食,马仁兴一行数人来到驻地县府国民党县党部要粮。该党部书记说他们是“杂牌军”,拒绝供粮。马仁兴勃然大怒,立即把这位书记捆起来,拖到师部关进了班房。南京当局闻讯后,认为骑兵三师有暴动迹象,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几天就派来了调查组,明察暗访,搜寻马仁兴的所谓“暴动罪行”。结果,因查无实据,定马仁兴无罪,并责令马仁兴立即放了党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坚持推行不抵抗政策,置东北沦陷而不顾,并调兵遣将去围攻积极抗日的工农红军,事实使马仁兴开始对蒋介石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情绪。

1932年,马仁兴所在骑兵第三师被改编为骑兵十四旅,马仁兴降为二十八团团副。正当他惆怅和彷徨之际,他的旧友李茂林、潘洪飞分别从烟台和南京来看他,其中潘洪飞竟担任了二十八团团副。以后,马仁兴和潘洪飞朝夕相处,遇事相互切磋。几年间,他们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文章。在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们常常互相问难,有时开展激烈的争辩。对共产主义由不认识到认识,最后发展到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向往。而对国民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抛弃了对它的幻想。马仁兴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到这时我的革命人生观已经形成,决心要跟共产党干革命了。”但是由于时机还不成熟,他不可能从旧军队中脱离出来。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B 白城记忆

■我看我说

这样拥抱经典,挺好

●张子晗

作为一种独特的观看方式,弹幕引入评论与社交功能,看剧的同时还能找到归属与认同

《三国演义》演到“桃园三结义”、“红楼梦”演到“宝黛初见”,一条条弹幕几乎覆盖屏幕……近日,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上线弹幕视频网站,引起广泛关注。“经典+弹幕”形式获得了极高播放量,年轻人以一种更活泼轻盈的姿态拥抱经典。

如何看待经典在弹幕中的流行?应该说,精彩绝伦的故事和入木三分的表演,让央视版四大名著电视剧经久不衰。穿越时代的持久魅力,是它们始终流行的重要原因。一个个经典人物形象,已超越剧中角色,成为一串文化符号,陪伴无数人成长,勾连着集体的荧屏记忆。

这种传播现象也得益于互动化的传播形态。作为一种独特的观看方式,弹幕引入评论与社交功能,看剧的同时还能找到归属与

认同。弹幕上,既有“红楼迷”补充原著知识、讨论剧情观点,也有剧迷在三打白骨精、隆中对、刘姥姥进大观园等经典片段打卡留念。有网友说,打开弹幕看四大名著电视剧,有种与几千人一起重温童年的感觉。还有网友说,在弹幕陪伴下再看四大名著,重要的不只是剧情,还有许多人组团观剧的快乐和感动。

经典一直都在流行,不同年代的追剧方式则各不相同。互动化的传播形态,是借助技术和创意,对经典的又一次升级:技术和创意穿针引线,经典内容焕彩出新。

放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互动化传播形态也在为文化产业注入新活力。在“观众弹幕”发送温暖祝福,在视频平台观看互动影视剧,在手机应用里搭桥拜结构、画京剧脸谱……在技术支持下,互动的概念更加丰富,内容与形式深度融合,用户之间即时交流,新的传播方式让经典流淌记忆与共鸣,也让文化传承从屏幕滑入心田。



东坡习射

●赵建国

朝,朝廷屡战屡败,先是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岁币与契丹成和,庆历元年(1041年)增加给契丹的岁输金帛,三年后再以岁赐银绢的名义与西夏成和,而边境却并未得到完全的安宁。

嘉祐六年,苏轼向朝廷进献《教习守策》《定军制策》,提出“使射天狼”。这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词句,自信满满,豪气冲天。这并非苏轼太守的酒后狂言。他一生与山林风月为友,诗文书画做伴,却并非文弱书生。他专学过射箭,并且能射善射,堪称神射手。

嘉祐六年(1061年)底,二十四岁的苏轼在进士及第,制科“百年第一”后,被派往陕西凤翔担任签判。公务之余,他没有沉浸在科场得意的赞誉里,也没有成天泡在故纸堆中,而是走出书房,去学射箭。他写诗告诉弟弟:“迩来又学射,力薄愁逐军”,自己臂力离弯弓射单差一点,但百步穿杨没问题,自得中甚至有些自负。

苏轼学射,当与其时北宋面临的风雨飘摇,西北和北面烽烟四

起,朝廷屡战屡败,先是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岁币与契丹成和,庆历元年(1041年)增加给契丹的岁输金帛,三年后再以岁赐银绢的名义与西夏成和,而边境却并未得到完全的安宁。

嘉祐六年,苏轼向朝廷进献《教习守策》《定军制策》,提出“使射天狼”。这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词句,自信满满,豪气冲天。这并非苏轼太守的酒后狂言。他一生与山林风月为友,诗文书画做伴,却并非文弱书生。他专学过射箭,并且能射善射,堪称神射手。

嘉祐六年(1061年)底,二十四岁的苏轼在进士及第,制科“百年第一”后,被派往陕西凤翔担任签判。公务之余,他没有沉浸在科场得意的赞誉里,也没有成天泡在故纸堆中,而是走出书房,去学射箭。他写诗告诉弟弟:“迩来又学射,力薄愁逐军”,自己臂力离弯弓射单差一点,但百步穿杨没问题,自得中甚至有些自负。

苏轼学射,当与其时北宋面临的风雨飘摇,西北和北面烽烟四起,朝廷屡战屡败,先是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岁币与契丹成和,庆历元年(1041年)增加给契丹的岁输金帛,三年后再以岁赐银绢的名义与西夏成和,而边境却并未得到完全的安宁。

嘉祐六年,苏轼向朝廷进献《教习守策》《定军制策》,提出“使射天狼”。这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词句,自信满满,豪气冲天。这并非苏轼太守的酒后狂言。他一生与山林风月为友,诗文书画做伴,却并非文弱书生。他专学过射箭,并且能射善射,堪称神射手。

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考古

●李存信

核心阅读

考古遗存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经过近百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源越来越稀缺。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古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地获取最详细的考古信息,甚至利用较少的考古资源,多学科共同参与,进行精细化的发掘和研究



上图:行唐故那车马坑的兽形金饰。



右图:大河口水M8031出土漆木器。



行唐故那车马坑车轱辘保护现场。

5月下旬,我们来到河北行唐的故那遗址。已经记不清这些年往返故那多少次了,从二号车马坑的5号车厢到现在的4号车厢,我们的实验团队仿佛一直在和几辆“车”较劲。

从北京到故那并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故那遗址位于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那村北,迄今探明遗址中心区域超过60万平方米,年代从新石器时代跨越隋唐。2015年至今,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行唐县文保所联合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累计发掘上万平方米,主体年代为东周时期,城址、墓地与居址共存,先后出土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以及金、玉石、骨角、陶等多种器物。众多遗迹现象和出土文物填补了中山国前期历史及考古研究的空白。

故那遗址的二号车马坑内,东西纵列摆放了5辆马车独轮车。位于车马坑最东端的编号为5号车,未见马匹遗骸,其他4辆均殉葬4马,共计16匹殉葬马匹散落在车辆驾驶室位置。为了进行更精细的清理和修复,我们为这些车马坑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室,进行实验室考古。

五号车车厢表面或以红黑、红黑白色漆绘,或贴饰金箔,两个直径达140厘米的大型车轮分别斜置于车厢体的上侧,每个车轮拥有辐条38根,而殷商晚期的辐条多数不超过30根。车厢横宽140余厘米,纵长106厘米,车厢残高达50余厘米,一条残长近280厘米的车轴横置于车厢底部。按车厢的横宽算,那是相当宽了。

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辆车厢左右侧和前后端立板的外表除了饰有繁复的髹漆彩绘图案外,车厢侧面后端区域还粘附有含沙粒的泥灰质漆层。该层表面镶嵌着成组对称的金质兽形饰,有着精美刻纹的金箔饰片明亮而细致,饰片上还有青铜的垫片。金箔很薄,其厚度不足0.1毫米。有这么多个金箔装饰应该是礼仪用车,髹漆纹饰为中原传统风格,但高大辐条的车轮和长车轱辘构造,则是北方草原地区车辆的特征之一。

除了故那,前不久我们团队又去了一次海昏侯墓。海昏侯墓作为实验室考古“大显身手”的成功范例被不断提及,大家津津乐道于此次实验室考古中用到的红外影像技术、拉曼光谱、显微分析等多种科技考古手段,包括低氧工作间等先进设备。低氧工作间有高压空气充瓶,有抑菌、净化及增氧等功能,对于文物保护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验室考古并不仅仅是这些。

在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工作者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脆弱的文物或遗迹,例如彩绘漆器的碎片、糟朽的木质遗迹、脆弱的墓葬壁画等。如果不在发掘现场对这些文物进行第一时间的保护处理,其所承载的宝贵历史文化信息将不复存在。还有一些保存完整、叠压状况复杂、无法立刻完成发掘的遗存,就必须采用

实验室考古的方式,将木质棺槨及周边回填土体一起套箱提取,通过异地迁移至室内,在安全有保障、技术条件许可和良好环境中进行精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这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还原墓葬原始状态信息,是田野考古的必要延伸和有效补充。

考古现场的整体套箱提取是实验室考古的第一步,是个技术活儿。在进行套箱之前,要根据墓葬的大小计算出套箱木板的长宽度,比如我们碰到的贵州遵义杨价墓差不多12吨左右,就需要长400厘米、厚度不低于5厘米的木板。这样的木材在遵义新蒲新区很难找到,最后是找到一家木材加工厂专门定制的。提取时要用防震材料包裹遗存,以避免磕碰。这些材料还得是不受微生物侵害的非污染性材料。套箱底部还必须使用金属框架进行支撑固定。

稳妥地运回室内只是实验室考古的第一步,之后要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和设备从遗迹、遗物中提取标本、样品,并实施科学分析检测。通过对各种遗迹遗物现象的观察,对材质、结构、工艺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形成有效的数据,为将来的复原或者复制奠定基础。常规的田野考古,一般先做最上层遗存,然后依次是中间层位和更早时期的遗存。但迁移到室内,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进行发掘清理,甚至可以对箱体进行翻转,从侧面或者从底面进行发掘,保证遗存的完整性、原始性。

在建成不久的临汾博物馆,观众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展厅看到山西翼城大河口水墓地一个墓葬的整体呈现。当年这个墓葬是整体套箱拉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实验室考古大棚,如今算是“完璧归赵”。在这个墓葬一共发掘了11个壁龛,在不同的壁龛里边出土了不同的漆木器,表面是髹漆层,木质部分已经完全丧失,靠土体来支撑。通过对这些漆木器的有效清理保护,考古人员对其的状况,包括形制、器型、规格有了清晰的了解。每件漆器上都有美丽的蚌饰。我们给这些蚌做了检测,是河蚌。这么多的蚌饰需要很多很大的河蚌,即使一个大的蚌,可以用做装饰的部分并不多。壁龛出土的漆木器质地脆弱,保存难度较大,后期展示难度也大,复原制作这批漆木器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考古人员为了这些漆木器,前前后后忙碌了近10年,但都是值得的。

2019年是二里头考古发掘60周年。筹备多时的博物馆隆重开馆,来自二里头遗址的两个墓葬在博物馆的重要位置进行了原状展示。这两个墓葬是二里头考古工作站2016年和2015年发掘的,在考古所的实验大棚里曾经呆了两年多。墓葬中的玉刀、绿松石、漆器、朱砂等进行了科学检测,清理的过程也全程做了记录。这两个墓葬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更适合展示,清理出的文物在提取了充分的信息后要不要放回原处,不同文物间的空间关系如何展示,以及不同地层的打破与叠压关系如何展示……许许多多的考古工作者都来到大棚里出谋划策,也是我们博物馆展示做的一次实验室考古。毕竟文物如果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和最初的关系,解释说明起来就需要更多的笔墨,而能让观众看到墓葬清理过程中的样子会更直观更有想象空间。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1936年第十三次发掘时,曾经发现了编号为YH127坑的甲骨文。为了保存这个殷商王朝的大型“档案库”的堆积现状,考古工作者保留了“甲骨柱”的整体,最后装入了巨大的木箱,整体运往南京。在室内工作持续3个月时间才完毕,共发现刻辞甲骨17096片,算得上殷墟发掘以来最重大的收获。这应该是实验室考古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地进行考古时,曾将贵族墓葬出土的大量精美漆器套箱提取,在室内进行仔细有序的发掘清理。

近些年,实验室考古已经成为与田野考古并存的“标配”。考古遗存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经过近百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资源越来越稀缺。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古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地获取最详细的考古信息,甚至利用较少的考古资源,多学科共同参与,进行精细化的发掘和研究。